



日本

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刘天纯 等著

人民出版社

日本 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 刘天纯 等著

责任编辑:陆丽云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刘天纯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1

ISBN 7-01-003942-9

I. 日… II. 刘… III. ①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②中日关系-研究 IV. D8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2414 号

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RIBEN DUIHUAZHENGCE YU ZHONGRIGUANXI

刘天纯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6.875

字数:405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3942-9 定价:2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部分 日本对华政策概观

第一章 概论日本对华政策	(3)
--------------------	-------

第二部分 近代时期对华政策

第二章 幕末日本人的中国观	(45)
第三章 大陆政策的理论基础及研究价值	(76)
第四章 对朝鲜、台湾及琉球的政策	(101)
第五章 大陆政策与甲午战争	(116)
第六章 大陆政策与日俄战争	(127)
第七章 大陆政策与抗日战争	(138)
第八章 大陆政策彻底破产	(154)

第三部分 现代时期对华政策

第九章 吉田茂其人及中国观	(177)
第十章 吉田茂内阁的对华政策及其影响	(208)
第十一章 田中政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236)
第十二章 90年代中日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265)
第十三章 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发展与变化	(299)
第十四章 日本对台政策与经贸关系	(328)
第十五章 日本科技政策与对华交流	(358)

第十六章	日本对华文化交流政策及其措施	(394)
------	----------------------	-------

第四部分 中日文化思想交流与研究

第十七章	妈祖信俗文化形成及对日本的传播	(421)
------	-----------------------	-------

第十八章	魏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440)
------	---------------------	-------

第十九章	片山潜与中国革命	(456)
------	----------------	-------

第五部分 展望未来

第二十章	展望 21 世纪初世界形势趋向与中日关系 发展	(483)
------	----------------------------------	-------

后 记	(533)
-----------	-------

第一部分 日本对华政策概观



第一章 概论日本对华政策

第一节 日本政治右倾化

最近一个时期,国际社会、日本政界与舆论界,对日本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提出过各种批评、责难和质问。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撰文分析日本现实政治与经济问题时,写道:“与亚洲各国相比,日本的政治这几年明显落后了。两年之内,总理大臣的席位四易其主,却没出现一个代表日本的人物,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也不明确。”^①而且中曾根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散乱时代”。而最近体现这种“散乱”特征的就是“日本的政治和泡沫经济”^②。所以,中曾根指出,正是由于这种“政治”的后果,才使“亚洲的一些朋友们对日本则有一种不信任感或者说是疑心,总担心日本扩军备战,会使军国主义复活”^③。另外,新闻舆论界也对日本“现实政治”状况不满,提出责难和质问道:“持续了三年的联合政权解决了它面临的课题了吗?指出了日本政治的方向了吗?回答是否定的。相反,我们不能不说它所带来的负面遗产却不少。……政权没有目标,政党为私利而维持政权,这必将造成政治责任的消失。”^④

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基辛格博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明

①②③ 中曾根康弘:《建立日美中共和哲学》,日本《读卖》月刊,1996年8月号。

④ 《联合政权的三年回顾》,日本《读卖新闻》1996年8月6—10日连载文章。

他对“现实日本政治”的看法时说：“在我看来，日本同过去一样，仍然没有同世界对话。恐怕许多国家都不了解日本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政治决策，也不知道日本究竟在考虑什么。”^① 因此，基辛格的结论是“日本的政治实际上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派系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而且基辛格认为，现在日美两国间的经济摩擦是由政治和思想分歧引起的。这就是为什么基辛格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外交》中指出，日本到某种程度时可能偏离美国的安全保障和外交政策的方向。日本究竟能发展成什么样的国家呢？！^②

对日本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日本学者也认为，为观察日本现实政治，得从历史发展的长河过程来分析研究。如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猪口孝教授分析：日本的政治的研究，需要用较长时期的历史观，从官僚政治到政党政治加以分析研究。据猪口孝研究认为，日本政治发展可分若干阶段：从 1853 年到 1890 年是确立中央集权国家政治体制时期；从 1890 年至 1931 年是引进议会制政治体制的时期；从 1931 年到 1955 年是确立官僚指导下的政治体制时期；从 1955 年到 1991 年是形成一党占优势政治体制时期；从 1991 年开始，进入改组时期。^③ 由此猪口孝则认为，“从迄今为止的日本政治的历史看来，这次的动荡状况在几年之内是无法平静下来的”。他接着指出：“我认为，只有经过十年即经过三四次大选之后构图才能趋于明显。所以，现在来判断日本政治将向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将选择何种政策？政党将把政策的选择集中在什么方向上？目前还很难说准。”但是，猪口孝认为，就目前而论，“说到政策选择，首先提及这样一点，就是人们对政治的不信任感非常强

①② 赤德森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日高义树：《基辛格博士预测 1996 年》，日本《现代》周刊，1996 年 1 月 13 日。

③ 猪口孝：《十年以后形势才能明朗》，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996 年 1 月 9 日。

烈”^①。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状况呢？这是因为大多数人们“对政治不抱什么期望的态度，对政治感到厌恶的态度”^②所致。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国内外政界、新闻界都认为，日本政治的发展是存在问题的。尤其是近年来，日本政治的发展，非但没有把日本引上所谓“光明日本”、“普通日本”的道路；相反使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强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进程，把日本引入了混乱和危机的深谷之中。正由于日本政治右倾化，而给日本带来的不是繁荣和稳定，而是混乱和危机，产生不少“负面遗产”。因此，在国际交往中，在对外政策之抉择上丧失了“政治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地位和重大决策，感到失望和不满的原因之所在。

那么，具体来说，近年来日本政治的“负面遗产”是什么呢，丧失“政治责任”表现在何处呢？我认为至少可以说表现在对内、对外政策，以及日本官方的防卫观、历史观、经济观等等各个侧面。例如，在对外政策方面，突出表现在对华政策和历史观的急剧变化及其影响。从日本对华政策及历史观的变化和影响中，可以反映出日本对外政策、历史观、防卫观、经济观等决策内容和影响。正如外国评论那样：“日本正在越来越显得敢于与北京对抗了。在中日关系中的方方面面——战略方面、政治方面以及经济方面——都可以感觉到日本这种新方针的影响。”^③

1997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1周年，又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25周年大庆的日子。我们本该怀着喜悦的心情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庆祝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1周年。可是，对中国

①② 猪口孝：《十年以后形势才能明朗》。

③ 东北亚问题专家布赖恩·布里奇斯：《中日对抗新阶段》，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8月1日。

人民来说,其心情并没有那么轻松和愉快。半个世纪以来,虽然中日友好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的愿望深扎人心。这是中日关系的主流、希望和未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在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中,依然存在一股非友好的暗流,一股鼓吹“皇国史观”、复活军国主义的历史翻案风。这就是在日本政界、财界、文化教育界以及民间中始终存在着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重温“大东亚共荣圈”旧梦的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右翼倾向,仍然坚持所谓的“皇国史观”,这是值得注意的危险倾向。这股暗流倾向所反映出的历史观的特点是:先从美化所谓“大东亚圣战”开始,进而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宣传什么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什么“民族自卫战”、“解放亚洲的圣战”等等。尤其对侵略中国的战争罪行,全然否认,认为在中国发生的所谓种种“惨案”,“是中国人民制造出来的宣传品”等。

二次大战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日本国内,否认侵略战争、美化战争罪恶的“皇国史观”宣传仍有增无减,作为代表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国会”,至今尚未公开承认侵略战争的罪行。本来1994年村山首相访华之前,曾动议让国会作出“不战决议”,三党联合政府也曾达成过一个“协议”,可是遭国会内右翼势力反对,致使村山首相只好两手空空来华访问,只能表达个人的见解和看法。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左右今日之日本政治的核心集团,对五十多年前发生的侵略历史和罪恶行为不肯正视吗?如果再结合半个世纪来的“日本修宪”活动,突破军费开支限额,军事势力大大增强,以及向海外派兵,鼓吹复活军国主义的种种事实来看,这不正说明日本政治日趋右倾化吗,能不使人们对日本产生“不信任感或者说疑心”吗,能不“担心日本扩军备战,会使军国主义复活”吗?!

第二节 对华政策的内容及特点

为了深入研究和批判皇国史观,揭露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种种事实,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历史上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及特点。下面从战前时期与战后时期两个部分来剖析日本的对华政策。

一、战前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

根据日本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战前,集中反映或代表那个历史时期(从明治到战败)的日本对外政策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及文化教育等各个侧面最基本内容的国策,则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大陆政策”。从某种意义讲,大陆政策的核心部分就是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

可见,透彻地剖析和研究日本的“大陆政策”,不仅是了解战前日本帝国对外政策,特别是理解日本对华政策的一把钥匙;也是研究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认识基础之一。换句话说,要想正确了解和研究日本近百年来所推行的,以对华政策为中心的国策,必先从分析研究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大陆政策”开始。

那么,直至今日,学术界对日本的大陆政策研究状况如何呢?是否接近解决问题的程度呢?客观地说,国际学术界对日本的“大陆政策”有过一些研究,也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过,坦白讲,由于历史观及其他种种因素制约,人们对日本的大陆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仍然缺乏整体而系统的了解和研究。因此,对日本的大陆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思想根源与理论基础,以及大陆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及其特点,特别是对大陆政策的性质、作用和影响等重

大问题，均未能作出充分的分析和研究。因而，其结论也就实难符合历史真实情况，出现了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怪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公开为日本帝国的对华政策核心内容——侵略行为、殖民罪恶开脱罪责，进行辩解，极力鼓吹所谓大日本帝国的皇国史观。

仅以日本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为例，老实讲日本学术界作为当事国学者们，理应对其有较深入而正确的研究成果问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的论著中，完全回避这一重大决策的历史事实，作出美化大陆政策、粉饰侵华罪行的结论，一味地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歌功颂德；有的论著中则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好像在日本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那样（大陆政策所带来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行为）的事情似的；更有甚者，完全反映日本各个历史时期当权的官方的观点，也就是皇国史观。如，对大陆政策的性质——对外扩张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本质根本没有触及，而仅仅根据照抄当时日本官方所发表的御前会议、军部、外务省等部门决议、宣言、声明之类的所谓“原件”，加以说明和论述。从内容上看，非但看不出大陆政策的侵略性质和殖民统治的事实；相反，把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的对外扩张称为“开拓”、“侵略”称为“进出”、“战败”称为“终战”。

战前日本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有何特征呢？它与战后日本对外政策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战前日本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天皇、天皇制帝国是近代对外政策的总揽者和责任者。换句话说，天皇也当然是对华政策的最高决策者。

日本的不少论著，认为日本近现代历史上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是军部或战争狂所为，而与天皇无关。这里涉及到战前日本的决策权和决策过程问题。虽然，战前日本的决策机关有：天皇、内阁、外务省、军部、枢密院、元老、重臣、五相会议、大本营一政

府联络会议、最高战争指导会等权力单位组成。^①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日本战前的决策权具有“分散性”^②的特征。尽管战前日本当局决策机构不少,可在行使其决策时,却高度集中于一统天下的天皇。日本明治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是受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的,天皇是国家元首、神圣不可侵犯,总揽宪法所规定的一切统治权(包括对内、对外大权),天皇是陆海军最高统帅,有宣战、讲和以及缔结条约之特权。^③也就是说,在对外决策方面,“天皇是总揽外交大权的”^④。

历史已雄辩证明,明治天皇在对外决策上,发挥日本权力机关的特殊职能,连续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一切证明,明治天皇对发动上述战争,都负有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昭和天皇时代,在对外决策上,虽然存在所谓“二重政府(军部与内阁)说”^⑤、“陆军与海军对立说”^⑥等议论,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作出重大决策时,依然是各种权力单位代表集中御前会议面前,最后由昭和天皇裁决的。^⑦因而在昭和天皇政府的对外决策中,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法西斯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由此可见,在日本近现代史上,明治、昭和天皇统治时期发动的侵略战争,主要对象国是中国。因此,应得出结论:战前日本对华政策核心是侵略战争、殖民统治,而对华侵略主要策划者和责任者是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当局。这就是战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最主要

①② 关静雄:《日本外交の基軸と展開》,ミネルヴァ书房,1990年版,第16页。

③ 参见《日本国宪法》,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馆,1982年版,第115页。

④ 关静雄:《日本外交の基軸と展開》,第16页。

⑤ 东乡茂雄:《时代の一面》,日本原书房,1985年版,第229页。

⑥ 近卫文相:《昭和への努力》,日本电报通信社,1946年版,第104—105页。

⑦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6年版,第630页。

特征。^①

二、战后对华政策的历程和内容

由于日本的国内条件与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因此,战后日本对华政策内容、性质与战前有本质区别。

就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而论,战后日本对华政策历程,可粗略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5年8月,日本战败,到1972年中日复交之前。这个阶段,日本政府经历过吉田茂、岸信介、石桥湛山、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近十余届内阁的更替。各届内阁的具体决策虽然也有某种差异,但是,就其对华政策的本质而言,基本上均执行了由吉田茂政府所创立的“否认中国,承认台湾”的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错误对华政策。^②当然,这种敌视新中国的对华政策,给中日关系发展带来严重不良影响。

第二阶段,从1972年7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到1993年7月,宫泽喜一内阁为止,自民党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这个时期,日本政府经历十余届的内阁更替,其中代表人物有: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竹下登、海部俊树和宫泽喜一等老一辈政治家。尽管各届内阁之决策各有特色,但在对华政策方面,基本上继承和执行了田中角荣首相所开创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尊重中国政府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① 参见刘天纯:《日本现代化研究》,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349页。

② 参阅鹿岛平和研究所编:《日本外交文书·年表》第1卷,第44页;外务省亚洲局监修:《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 1949—1969年》,霞公会,1970年版,第37—38页。

的一部分”，维持了中日友好的基本国策。^①

第三阶段，从1993年8月，细川护熙的联合政权成立，直到1996年桥本龙太郎的强硬政权执政。正如美国学者格雷格·马斯泰尔所说：“桥本无疑将是个强硬派人物。他已经发现那在日本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而且政治家们不会放走能够获胜的问题。”^②这个时期，日本政府虽然四易其主（细川、羽田、村山和桥本），其联合政权内部党派势力消长也有变化；但是，在对华政策方面，其共同特点：都已开始，不同程度地改变日本的传统对华政策。也就是说，他们正在修改由田中角荣首相，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建立在两个条约^③基础上的，坚持中日友好的传统对华政策。事实表明，自日本联合政府建立以来，在对华的政治、经济、外交、防务等政策方面，以及对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政治与经济问题等的认同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倒退。

标志日本对华政策最新变化，也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突出表现，则是日本将要改变传统的对华合作政策。

第二届桥本龙太郎内阁刚刚建立，日本执政党的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于1996年11月28日就提出了日本外交政策新的“方针”。从这个“方针”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对华政策新内容和变化。“方针”指出，日元贷款（对华）时代正在宣告结束，“应尽快就整个对华合作政策进行重新考虑”。“方针”要求遵守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原则，将军费和民主化状况作为实施标准，“为促使中国向积极的方向转

①. 日中国交回复促进议员联盟编：《日中国交回复关系资料集》（日中国交资料委员会，1992年），第139—140页。

1996年11月，美联社华盛顿电文，为《桥本龙太郎被视为美日贸易上的强硬人》。

这是1972年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国联合声明》、1978年8月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友好条约》。

变,日本有必要就增加国防政策透明度等问题,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

日本《产经新闻》评论指出,自民党的外交调查会 28 日发表的外交政策方针表明:要重新研究对华日元贷款,并制止自从“自民党、社会党、新党”建立联合政权以来,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而重视同中国等国的关系这一优先“亚洲外交”的潮流。比如提出也要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等。这是它的特征。把加强日美联盟看成是“没有发生可喜变化时的最终依托”,重申日美关系是“最切实、最重要的基轴关系”。^①

总之,由于日本政治不断右倾化,表现在对华政策方面:极力改变传统的对华友好的合作政策,促使对华政策日趋倒退和改变,毒化中日友好关系事件层出不穷,极力为复活军国主义招魂扬幡,拼命鼓吹皇国史观,宣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在日本出现的这种危险而令人痛心的动向正在冲击和动摇着,由中日老一辈政治家们所开创的,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础。这不能不使人们严重关注和万分担心中日关系日趋恶化的,令人不安的前景。总而言之,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权力归属与决策过程,同战前完全不同了。战前那种天皇控制外交政策大权,军部以天皇名义控制“统帅权”,使其“独立”于内阁,而内阁的外交大权,又往往受贵族院和枢密院束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战后却出现了以内阁总理大臣为首的,强有力的首相主导型国家政治体制,总理大臣是国家最高行政长官(首长)。^② 不过,也并不是内阁总理大臣独断专行,他要受政党控制和影响。战后日本政治史表明,除少数情况外,政府基本上

① 1996 年 11 月 29 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的,题为《~~自民党外交调查会~~内重新考虑对华日元贷款问题作出政策决定》、《突出自民党色彩》的文章。

② 见《日本国宪法》,株式会社小学馆,1986 年版,第 78 页。